

国学经典

典藏版



长短经

[唐]赵蕤 著

刘国建 刘 华 注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 典藏版

长短经

[唐]赵蕤 著

刘国建 刘 华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短经 / (唐) 赵蕤著; 刘国建, 刘华注译.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1
(国学经典: 典藏版)
ISBN 978-7-5348-6681-4

I. ①长… II. ①赵… ②刘… ③刘… III. ①政治-
谋略-中国-古代②《长短经》-注释③《长短经》-译文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0611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mm×960mm 1/16 印张: 33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长短经

前 言

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有关谋略理论的阐释著作占有相当的比例。抛开正史、编年史，单说诸子百家，至少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这些地位显赫的学派，其学说的核心便是治国用兵之术。这治国用兵之术便是中国古代谋略的中心议题。或许，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版图的嬗变，异姓禅让、黄袍加身的朝代更迭，血雨腥风的宫廷厮杀，诸侯相争的战争搏击，以及对万世一系的帝王梦的渴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感，甚至于对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的冲动，对功高震主的恐惧，对成功的立身处世之术的向往，都可能是催生发达的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土壤。不管什么原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谋略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至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处都能找到它的踪迹。难怪席勒说谋略和爱情才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

大体说来，中国古代谋略经典可分为三大派系：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领域，以《韩非子》为其代表；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领域，以《孙子兵法》为其代表；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领域，以《鬼谷子》为其代表。三家齐辉，各伸所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活剧。然而，合流三家，融汇诸子，删繁摘要，高屋建瓴，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之大成

的，当首推唐代赵蕤的《长短经》了。

赵蕤，字太宾，梓州人，为唐朝中期的一名隐士。赵蕤操行高尚，唐明皇屡征不仕，潜心研读，学问博大，桃李满天下。据说，唐代一大批文臣武将即出自赵蕤门下。他弃绝守成，主张变通。他说：“三代不同理，五霸不同法”；“御世理人，罕用沿袭”。他以历史学家的博大、政治学家的敏锐和谋略学家的睿智，纵观上起尧舜下迄隋末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分门别类，从六十四个方面，发思古之幽情，究成败之得失，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人生的智慧，升华出了博大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体味无穷。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读了《长短经》，兴奋不已，欣然题诗，在盛赞《长短经》的同时，不禁发出了“既是梓州善经济，不应辟召又何焉”的感叹，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长短经》的内容大体分为五个方面：识人用人之真谛，是非正反之辨析，历史画卷之展示，人生智慧之杂说，用兵理论之总结。其中尤以识人用人方面着力最重。

第一，识人用人之真谛。这是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赵蕤无成见，无偏私，登临绝顶，博采众家，融会贯通，从品目到量才，从知人到善任，从君德到臣行，从主体到客体，从上级到下级，从正面到反面，多方位多视角观照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博大与精深。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虽然还不能纳入现代人才科学的范畴，但它极富智慧，极富感情；它世故，它老到，它生动，它有趣；它举一反三，它灵活多变；它既重视一般原则，又强调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人而变，因机而变；它史论结合，娓娓道来；它高屋建瓴，铿锵有力。识人，它从人伦亲情着眼，渐次推进，直透人的心理深层；用人，它循着理性光芒的照耀，以事功为大，不以个人善恶定夺。总之，它重情而入理，狡黠而不诡诈，较真而不失大度。

重情而入理。人是情感之物，再刚强再粗暴的人，也有他细腻柔弱的情感世界。所以，推知为人，而直视人的情感世界，是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一个特点。人生天地间，父、母、兄、弟、妻、子是天伦之亲，古代称之为“六戚”。如何对待“六戚”，就成为古圣先贤考量人的品质的一个重要尺度。试想：一个无孝于父母、无爱于妻子、无怜于兄弟的人，还谈什么忠？还谈什么友？还谈什么情？还谈什么义？所以当齐桓公向病危中的国相管夷吾请教国事时，管夷吾力劝齐桓公驱逐那些不惜煮子为桓公、毁身为桓公、不奔父丧为桓公的人，也正是基于这种天伦之情的考虑。所谓“忠臣必由孝子出”，这句中国古代的至理名言，正是披沙拣金的经验之谈。这是重情。

所谓入理，是说情中有理，重情而不重偏激之情、疯狂之情、如痴如醉之情，而是大众之情、普天下之情。这情，便是入理之情。伯夷、叔齐谏阻武王克商不果，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尾生与女约会，女子失约，大水将至，尾生义不爽约，抱柱而死；孝子曾参不肯离父母半步，如此等等，皆属偏激之情、疯狂之情、如痴如醉之情。这情怀令人感动，却不令人羡慕；它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才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鉴识人才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实用的、功利的，因而它贵忠、贵能、贵智、贵谋、贵节、贵义、贵胆、贵勇、贵廉、贵信，贵一切有利于事功的品质。惟其如此，巧言令色、矫情伪饰、顺风转舵、阿谀奉承等，就为充满了理性光辉的主流人才观所不齿；相反，“听其言而观其行”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才之术的主心骨。这是“重行”；“重行”才是最具特色的“入理”。所谓“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所谓“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爱，贱则观其所不为”；所谓“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

如此等等的观人之法，真可谓用心良苦，费尽心机。这种将观人由感性上拔（至理性）和下沉（至实践）的方法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智慧 and 成熟。

狡黠而不诡诈。孔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这位睿智而世故的圣人在识人方面也时常走眼，所以才有“险于山川”、“难知于天”的感叹，才有许多关于识人用人的警句名言。作为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在识人方面可谓言行、容貌、情志均观，真假、虚实、奇正并用。诸如以言钓情、以事钓情、以物钓情、以志钓情、以视钓情、以色钓情，所谓揣情，所谓摩情，所谓于人甚喜之时极其欲，于人甚惧之时极其恶，以至于用取悦、用激励、用利益、用谄媚、用名誉、用廉洁、用成功、用信用，如此等等钓取人的心理的方法，都颇有些狡黠刁鬼的味道。但不能说是诡诈。想想看，对于那些“厚貌深情”的人，对于那些紧闭自己心灵大门的人，没有“引蛇出洞”的方法，没有投放竹竿引人上爬的方法，没有诱导，没有激励，不“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不置之于一定的场景中，是难以了解其内心情怀的。这些方法或心理暗示，或实践验证，是鉴识人才的必由之路，谈不上诡诈。诈者，欺也。上述方法谈不上欺。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之“观行”，不仅仅是被动地“等着看”，还在于主动出击，去发现、去验证、去品评、去举荐，于是便有了这五彩缤纷、实用而有趣的鉴识人才的方法。

较真而不失大度。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用人方面。较真，是说中国古代对人才的品评与论列繁富细腻，不厌其烦。所谓人才十二种，偏才十二种，所谓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所谓英、俊、豪、杰，所谓英，所谓雄，所谓英雄，所谓人臣“六正”、“六邪”，以及各色人等的长短优劣，不能一一。这便为人才的鉴识和使用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参考坐标。但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决不追求完美。

如果说追求完美的话，它追求各得其用的完美，而不追求人格的完美。深得汉高祖刘邦器重、并曾为刘邦六出奇计的陈平是“盗嫂受金”之徒，魏武帝曹操“唯才是举”、余者不问的求贤令多少有些饥不择食的嫌疑，但这些故事之所以被传为历史的佳话，正是因为刘邦和曹操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驾驭人才的高超技能。

不但不追求人格完美，相反，对于具有完美人格的所谓贤人君子往往会束之高阁。管仲病重，齐桓公向管仲请教鲍叔牙是否可以接任国相，管仲说鲍叔牙清正廉洁，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为伍，看到别人的缺点一辈子忘不掉，他决不适合为相。战国时期的苏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劝说齐王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燕王十分高兴。有人便向燕王谗毁苏秦，说苏秦是一个时常出卖国家、反复无信的贼臣，燕王因此疏远了苏秦。苏秦便向燕王说：我的不诚信的品质正是大王的福气，假设我守信如尾生，廉洁如伯夷，孝悌如曾参，也就不可能来侍奉大王您了。守信的品质是自我修炼的结果，不是进取成功的方法。苏秦的话尖锐而深刻。黄石公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让膀大腰圆的人背土，让瞎子推车，让驼背的人涂抹，各得其宜。这便是黄石公所说的“因其至情而用之”。魏武帝曹操说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难道陈平算得上德行高尚的人，苏秦算得上守信的人吗？然而，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使得弱小的燕国自强于诸侯之林，这是用人之长的结果。曹操老辣，目光如炬，所言颇得用人之要。

不追求完美，“因其至情而用之”，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人才观。

第二，是非正反之辨析。这部分赵蕤虽然用墨不多，但却是全书的灵魂之所在。《长短经》之被称为“反经”，也正是因这部分（卷

三“权变”内有“反经”一篇)而得名。“是非之辨”与“正反之辨”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是非之辨”主要是指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同一命题、同一理论、同一方法、同一学说、同一学派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正反之辨”则主要是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事物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逐渐走向了其反面。或者以“正”之名行“反”之实,或者近观为“正”、远观为“反”,或者成中有败、是中有非、进中有退、强中有弱,如此等等。“是非之辨”与“正反之辨”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合二为一,浑然莫辨。是与非、正与反的辩证逻辑贯穿于《长短经》的全篇。

是非也好,正反也罢,核心就是一个“变”字,没有纯粹而又纯粹、笔直而又笔直、亘古不变的事物。无论粗细之理、仁贤之用、德才之比、上下之宜,无论刑罚与教化、治家与治天下、窃家与窃国、游侠与儒士、用才与妒才,都有个是非之说、正反之论。赵蕤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宗,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谓仁,要求泛爱博施,却容易催生偏私之情;所谓义,要求守节立行,却容易流于哗众取宠;所谓礼,要求恭敬谨慎,却容易流于繁琐怠慢;所谓乐,能够调和情志,也容易使人生发淫逸放荡之心;所谓名,可以用来正尊卑之序,也容易使人生矜持篡逆之心;所谓法,可以使众人整齐如一,也容易使人越法背分;所谓刑,可以震伏那些不服法令的人,也容易导致凌辱、暴虐百姓的行为发生;所谓赏,既可以激励人们尽忠效能,也容易导致人们之间的纷争。

慢说如此复杂的问题,即便是众人为之欢呼、看似毫无争议的成功或胜利也未必就是真正的胜利。赵蕤举例说,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失利,四十万将士向秦军投降。而秦将白起背信弃义,将四十万将士全部坑杀。有人问:白起所为可谓奇将之举吗?魏人何晏对此论议颇详:白起诱降坑杀四十万赵军之举,岂止是“残酷”一词能概括得了的吗?恐怕他以后也难以重新得志了!假使赵国

将士预知降而必死，必定戮力而战，即便赤手空拳犹可畏惧，更何况四十万披坚执锐之士呢？诸侯各国看到降秦的将士头颅依山，归秦的士卒骸积成丘，则日后交兵，何众肯服，何城可下？必定根绝杂念，与秦决一死战。所以白起之举虽然损灭了赵国四十万生命，但相反的结果却强化了诸侯各国团结抗秦的决心。这正是欲得一朝之功，却强天下之守。从整个战争态势上说，白起是在凯歌行进之中削弱了自己的优势，军事上表面的胜利反而阻塞了秦国政治、外交的道路，从而延迟了统一天下的进程。为什么这样说呢？赵国虽然败于长平，但并没有亡国，假若重整再战，再出一个像马服君这样的大元帅，究竟鹿死谁手，恐怕就非往昔可比了。此后，秦国之所以不敢加兵于邯郸，不仅是因为赵国又请出平原君做统帅，秦国畏惧平原君，更为重要的是秦国惧怕各诸侯国联合救赵，秦国对此心知肚明，只是讳莫如深，不便言说罢了。如此说来，白起之举，何“奇”之有呢！

这便是“是”中之“非”、“正”中之“反”。所以，无论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严峻，兵家的神奇，纵横家的诡譎，还是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运用之妙，贵在“适变”，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情而变，才能缓解“是”中之“非”、“正”中之“反”。赵蕤在《时宜》篇中特别指出，事情往往有目标相同、方法相同，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时势不同造成的。所谓时势之不同，有“形”之异，有“势”之异，有“情”之异，有“情”、“形”、“势”之异。所以须“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赵蕤“趋同势异”之论，取材精当，对比鲜明，人物生动，议论充分，将其视为全书的点睛之笔再恰当不过，请读者诸君注意。

第三，历史画卷之展示。这部分共有三篇：《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三篇从三个层面或三个视角总结了历史的经验。这是赵

蕤对历史经验的战略性思考和总结。

《霸图》以人物为经，以史实为纬，从周朝八百年的盛衰历史到秦朝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从刘邦龙兴沛国、项羽垓下自刎到汉室的覆灭，从三国鼎立到晋室一尊，从六朝的急速更替到隋朝的顷刻瓦解，其间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末代君王的暴虐荒淫，成功的轨迹，失败的辙鉴，英雄的创业与悲欢，百姓的力量与心愿，以及历史行进的大势脉络，赵蕤都悉数道来。他总结前人的观点，认为帝业之兴，有待两条：一为大势所趋，二为人心所向。

所谓大势所趋，指的是天命大势。他引述干宝之论：帝王的兴起，有待天命相助；朝代的更替，亦非人力可为。尧舜在部落内部禅让，体现的是文德；汉魏异姓间的禅让，则是态势所逼；商汤周武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则是天命人愿；汉高祖和汉光武转战征伐，则是奠定功业之举。各因其天运大势而得天下。他感叹：顺应天时大势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所谓人心所向，是指用在得人。他引述范晔之论：凡帝业之失、祭祀之绝，其由盛至衰以至败亡的过程，自然是有原因的。夏商周三代由贪宠女色致祸，嬴氏秦朝因奢汰暴虐灭亡，西汉因外戚专权而崩溃，东汉则因宦官之祸而倾覆。自秦汉至周隋，观察其兴亡轨迹，虽然也有命运天数的因素，但大体说来，得天下者，皆因有贤人豪杰的辅佐，能为百姓兴利除害；失天下者，皆因任用奸佞小人、奢侈无度所致。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又说：“远佞人，去僻恶。”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你看，赵蕤强调的还是识人用人的重要。

《七雄略》和《三国权》则通过“七雄逐鹿”和“三国相争”这两个恢弘惨烈、可歌可泣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历史现象的展示，活生生血淋淋地阐释了纵横家学派的谋略思想。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诸葛孔明的隆中运筹；六国纵亲以御强秦，孙刘联合以抗曹操；秦王的远交近攻，曹操的各个击破；六国的覆灭，三国的归一……这

两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里还暂且不去说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苦难。赵蕤在展示史实、凸显谋略的同时，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时势造英雄，而这不断造出英雄的“时势”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或者说，如何才能维持天下一统，实现长治久安，使苏秦、张仪之徒无用武之地呢？

赵蕤说，周朝统治天下历时八百余年，周朝后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也就恣意横行，不以周天子为意了。虽然东周时期王室衰微，但周朝仍能枝叶相持，各国诸侯依然扶持着周王室，周天子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其间虽然也有楚王问鼎、晋侯请隧（请用天子葬仪）等不轨之图谋出现，但都被姬姓诸侯所扼制。难道当时就没有奸雄吗？端赖诸侯对周王室的维护啊！谚语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讲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及秦始皇一统海内，鉴于周朝诸侯强大、王室衰弱的教训，废封建，立郡县，其子弟也沦为匹夫百姓，功臣虽然也勤勉效力，拥有统治城邑大都的权力，但却没有尺寸之封地，皇帝一人宰制天下，独擅其利。然而，陈胜、吴广以一介匹夫振臂一呼，群雄蜂起，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布衣百姓之所以敢于唤起民众与天子抗衡，除了秦政酷暴、百姓思乱的因素之外，更在于秦王孤身一人，使他们毫无诸侯勤王的担忧。赵蕤据此得出结论：采用郡县制统治国家，易使百姓萌生篡逆之心；采用五等封建制统治国家，又容易遭致诸侯横暴的祸端。但综合衡量，封建制还是优于郡县制的。鉴于西汉诸侯王中，大者强者反、弱者小者忠的特点，赵蕤认为，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不失为治国安邦的两全之策。

第四，人生智慧之杂说。其实，智慧并不太好“说”。但赵蕤“说”了。准确地说，他说的并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提出了在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题面前，智慧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意识到智慧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本身也是智慧。因此，这里所讲的“人生智慧”，

正是赵蕤体验人情之复杂、感悟人生之艰难的智慧。

试举几例。人心如面而又“厚貌深情”，虽然人情必于相应的事物中显现，故有“钓情七法”，但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七法”绝难包打天下人心。所以智如孔子，也愤然说道：“予欲无言。”这是讲钓情之难、说人之难。魏将乐羊率军攻打中山国，其子在中山，中山国君煮了乐羊的儿子并送给乐羊一杯肉羹，乐羊忍住眼泪，一饮而尽，以示必战的决心。魏文侯十分感动，说：“乐羊为了我而吃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肉。”而有人却向魏文侯进谗言说：“自己儿子的肉尚且吃得下去，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乐羊凯旋，魏文侯奖赏了乐羊的战功但却因此怀疑其心的残忍。这是讲忠君之难。孔子说，君子贞洁正直但不必诚实（“君子贞而不谅”）。又说“信近于义，言可覆也”。他的意思是说只要符合义的原则，不必讲求诚信，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义者，宜也。难道诚信不“宜”吗？这是讲信守义之难。父子兄弟君臣之间，“贤”是可以依靠的吗？狐卷子说，贤也靠不住。做父亲的贤超不过唐尧，但他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流放了；做儿子的贤超不过舜，但他却被自己的父亲瞽叟囚拘；做兄长的贤超不过舜，但他的弟弟象却傲慢无礼；做弟弟的贤超不过周公，但他的哥哥管叔和蔡叔都被他杀掉了；做臣子的贤超不过商汤、周武，但他们分别讨灭了自己的君王夏桀和商纣。这讲的是恃贤之难。人之常情是：越是恩情深的人，对他的敬养须特别谨慎周到；特别亲爱的人，其要求也特别细腻周到。关系亲密而得不到特殊的对待，谁能不产生怨恨的情绪呢？由此可知，所谓忿怨的情绪，恰恰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所谓恩情，正是怨恨赖以产生的源泉。这讲的是人情的恩怨纠葛。其他诸如取予之道、命运之数、祸福之变、人格与环境、理想与现实，等等，赵蕤都细致入微，逐一论列。所以称这一部分内容为社会之总览、人生之百科，亦不为过。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就不逐一评述了。

至三。则是对《孙子》军事思想的总结与阐发，此不赘言。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长短经》作了简略介绍，分析与讲评仅为笔者的一得之见，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长短经》博大精深，但愿笔者的一得之见能够成为催动读者进一步体悟、思考和创新的激石，使赵蕤的谋略思想在这竞争激烈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这才是谋略的真谛。

此次整理《长短经》，底本采自《四库全书》，并参校其他版本，择善而从。注文为赵蕤本人对文义的阐发，现限于篇幅，此次将注文一并删去，并无伤大体。本书注译过程中，亚伟、亚杰、方泥、若雨、东方、朝朝、方明、安然诸君或查找资料，或抄录书稿，或校对书稿，在此谨表谢忱。

刘国建

2006年10月

目 录

自序	19
----	----

卷一（大政）

大体第一	25
任长第二	28
品目第三	31
量才第四	34
知人第五	38
察相第六	48
论士第七	54
政体第八	66

卷二（德行）

君德第九	71
臣行第十	94
德表第十一	115
理乱第十二	120

卷三（权变）

反经第十三	127
是非第十四	134
适变第十五	178
正论第十六	188

卷四（霸纪上）

霸图第十七	199
-------	-----

卷五（霸纪中）

七雄略第十八	225
--------	-----

卷六（霸纪下）

三国权第十九	259
--------	-----

卷七（权议）

惧戒第二十	301
时宜第二十一	352

卷八（杂说）

钧情第二十二	365
诡信第二十三	375
忠疑第二十四	381
用无用第二十五	386
恩生怨第二十六	388
诡顺第二十七	390